

家庭暴力加害人認知行為取向評估研究 初探——論「再犯」成效合適性

謝宏林、曾華源



壹、前言

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結果是否具有成效？這對處遇實務工作團隊而言，是值得深思的問題，其中涉及處遇方案是否有改善加害人的暴力行為，有無減少受害者繼續遭受暴力攻擊。另一層次則是處遇人員對參與處遇計畫目的與期望是否有達成，及處遇成果責信的展現，更有甚者，還牽涉到許多的關心人士（受暴婦女、政策決定者、納稅大眾）（Dobash, Dobash, Cavanagh, & Lewis, 2000: 6）對整體方案的信心問題。

在整體處遇方案的過程中，對加害人正向的改變論點與看法，是否猶如在團體中所呈現的一樣，或是加害人在環境被迫使然的狀況下，依循「當下」形勢不得不的利益選擇。表現對處遇順從與一致，但回到真實的生活中，此一認知行為是否能在短暫的學習後納為己用，營造幸福的居家生活。

方案的一體性及無區隔的處遇策略，是否能適用到所有的加害人？或是處遇時程就所有加害人對暴力認知皆是有效？受限於方

案的執行，尤其是法院的裁決而言，加害人處遇時限與國外比較是相對的短期，故在有限時間中，有多少的工作，是處遇團隊所必須加把勁，但有時事與願違，處遇的成效或許就靠加害人是否「再犯」來認定成效。惟「再犯」的認定者為誰？提供的訊息是否正確或有全盤的後續追蹤流程？

「再犯率」是目前國內外對加害人處遇成效的有效指標，但在此再犯率的解譯下，有多少的訊息是能符合成效？其是否能代表整個處遇方案的成果？再犯率是否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擾，有增減的影響整體所謂再犯成效。再犯的實質意涵是否能清楚呈現加害人改善的程度，及暴力消滅與否，能否關聯上處遇的脈絡，及處遇整體的靜動態結構，如上述經再犯的界定無法回答的，是否有其他的替代成效指標，可實用性的代表評估研究成果。

既已牽扯評估研究，該如何著手研究方向與對焦研究對象，其範圍有多大？評估時程有多久？該以何種觀點切入研究？為此，本文透過家庭暴力加害人認知行為取向的處

遇模式，討論其處遇脈絡及對成效的界定，並就其處遇本質連結評估研究的整體焦點。文中也批判現行再犯指標，其非為家庭暴力認知行為取向處遇的主要成效，但卻又是大多數認知行為取向處遇團隊樂於採用，其準確性及代表性，是否足以證明處遇的成敗？

貳、國內外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模式現況

國內外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模式，雖有因國情及文化特質，甚而是處遇機構對加害人的認知樣態不同，各類型的處遇模式有其獨特的發展脈絡與介入方式，其中處遇方案的型態有些是兩性平權的教育模式，內容以權控機制及平等觀念為主架構，有些則是採認知行為模式，或結合心理動力模式，且處遇方案大多以團體方式進行，除少部分加害人因受限個人屬性，如精神疾病、邊緣性人格等，較無法在團體中進行外，成員都已封閉或開放式的加入團體。

一、國外加害人處遇模式

目前國外加害人處遇模式，主要有五大模式：Duluth、EMERGE、AMEND、The Third path、Compassion Workshop。各模式皆有依循家庭暴力形成原因理論作為其處遇模式設計參考，加上各模式的運作脈絡中，各有中心主題配合處遇策略。如 Duluth 模式，主要是以女性主義觀點為主，其強調父權社會中的權控機制與不平等的偏差觀念之謬誤，透過教育宣導方式，促使加害人獲得正確訊息調整家庭暴力行為(Eadie & Knight, 2002: 171;

Pence & McDonnell, 2000: 249-252; Dobash, et al., 2000: 48-49)。EMERGE 模式，主要是採女性主義觀點結合認知行為處遇，其創立於 1977 年，是最早的加害人介入方案，其作法是以面質方式要加害人負起責任並學習非暴力的行為(Adams, 2000: 310-321)；AMEND 模式，主要是以性別為基礎之認知行為理論，強調高危險或長期之施暴者應持續 1-5 年之處遇。The Third path 模式，同樣是以性別為基礎之認知行為理論，強調區分不同危險程度之施暴者，施以不同週數的處遇，並鼓勵志願參與志願團體。Compassion Workshop 模式，以前述模式不同的是採依附理論為處遇主軸，強調加害人曾是受害者的觀點，認為透過認知重建技術來協助加害人復原，以減少因情緒所影響的暴力行為(林明傑, 2001: 68-69)。前述五種處遇模式，除了 Duluth 模式未直接採用認知行為處遇為介入策略外，其他模式皆採認知行為處遇模式，並結合女性主義觀點協助加害者認知的改變。

二、國內加害人處遇模式

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方案自 2001 年 2 月衛生署訂定之「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計畫規範」，其中第二條明定加害人處遇為戒癮處遇、精神處遇、心理輔導與其他認知教育與輔導。迄今已有多個處遇團隊加入輔導家庭暴力加害人行列(潘淑滿, 2007: 64)，並持續性針對法院所裁決須接受上述處遇輔導的加害人進行處遇介入。各團隊皆因法律授權而與非志願性加害人長期互動，期間更有多個團隊經臨床實務運作與研究搭配，發展

出各團隊適用的處遇方案內容。惟在長期的時間、人力、物力投入下，何種處遇方案是較為契合加害人的處遇方案，至今仍莫衷一是。就處遇團隊而言，除中華精神分析學會以 TA 模式進行輔導處遇外，其他處遇團隊皆是採上述認知行為取向處遇模式（Cognitive-behavioral Approach）為主流介入處遇方法（林明傑，2001：74）。就方案內容大致結合女性主義倡導之權控議題教育模式，及個人心理層面之認知行為取向模式為主，加上情緒疏導、看待暴力責任、教育正向的親密關係、家庭暴力法律課程、自我肯定訓練等內容；處遇目的則是預期達到預防再犯、防止加害人物質濫用情形、健全家庭互動模式、重視加害人正向經驗、維持團體同儕支持、促進加害人再社會化等為訴求。

參、認知行為取向的意涵與運作

一、認知行為取向的意涵

Albert Ellis、Aaron Beck、William Glasser 三人為這取向的領導者。三者都強調檢視案主如何思考自己及其所處的世界，視需要協助他們改變這些認知，並確認案主藉著日常生活行為，將認知用行動表現出來（陳金燕等譯，2000：374）。認知行為取向是根據認知過程影響情感和行為的理論假設，通過認知和行為技術來改變案主不良認知的方法，亦即是透過處遇策略引發案主察覺促發事件（A），以及確認後果（C），再協助案主以連鎖思考方式，推論所遇困境與引起困擾的核心信念為何？（林娟如、周桂如、夏一新，2010：43），其有三個主要的假設：1.行為與

情緒是被想法所決定的；2.情緒問題係源自負向的及無法放鬆的信念；3.藉由改變負向的且無法放鬆的信念，則情緒困擾是可以被降低的（林瑞欽，2004：30）。由此，面對相同的情境因素，當個人將原本的負向信念，轉化成正向想法時，情緒會變的與以往不同，行為自然而然的也就不同。

Ellis 的理情行為處遇（REBT）的觀點指出，人常因自己扭曲、不實在及非理性的思考模式，促使自己成為情緒的受害者，故處遇任務是糾正案主的思考型態，以減少非理性想法，同時幫助他們改變功能不良的感受與行為。代表性的典範策略即是以情緒 ABC 為介入理念，讓案主可以主動地選擇他們的信念系統，但他們常常都選擇了導致其認知扭曲的非理性語言，理情行為處遇試圖把這些非理性的觀點提升到意識層面且促成改變。Glasser 的現實處遇（Reality Therapy）是指「掌控並為自己的生活負責，且面對自己行為的後果」，也即是案主須主動瞭解個人所想要和需要的、檢核他們的失敗和他們現有的有利資源，以及滿足該需求所必須具有的環境因素，除非是在現實世界中，否則個人無法滿足其需要（陳金燕等譯，2000：382-411）。現實療法僅注重意識層次，未涉及潛意識層次，故對夢境部分未論及，也未說明衝突的壓抑及潛意識影響想法、感受、行為和選擇的程度，加上未處理情感轉移的議題，喪失了在處遇過程中，示範正確的人際關係效果。

二、認知行為取向運作模式

Rose（1998）認為認知重建（Cognitive

reframing) 包括認定出案主的自動化思考，並幫助其找到更有建設性的替代方案（引自林瑞欽，2004：31）。其認知重建的模式（如圖一）強調在某些特別情境下的自動化思考，是基於許多個人和人際經驗中的想法，這些人在生命早期學得了負面基模或核心信念，也就是所謂的核心信念是很基本且深層的，他們通常沒有太仔細去想過這些核心信念，這些信念被人們認定是絕對的真理，此層次的信念會形成篩選、鑑別與解釋環境刺激的基礎，且它是認知組織中相對持久的成分（古永利等人，2010：47）。只要他們認為新情境中條件與過去經驗相似，這些基模就會被引發，接著認知扭曲會導致對現實的錯誤知覺。

核心信念影響著中介信念的發展，其組成元素是態度、規則和假設，進而形成自動化思考。自動化思考和非理性想法在本質具有強迫性，會反覆不斷地出現，潛藏在強迫行為和思考架構下的經常就是完美主義。非理性想法的成因則是難以達成，過度類化或對事件的明顯扭曲。認知行為處遇介入的目的，即是要辯明負向的自動化思考（王翠彬、陳雯婷，2005：75），將負向基模和認知扭曲的自我概念，透過認知重組的方式，重新界定與改變案主的非理性信念（Becvar & Becvar, 2006:241；劉耀文，2005：41；林瑞欽，2004：30-31；簡瑞良、張美華，2004：34）。唯此，處遇介入的目的，最重要的工作是要改變信念所引發的自動化思考，將其以認知重構的方式進行改變。但在此工作的同時，處遇的另一層意涵，是要深化其中介信念，使其能阻斷不斷衍生的負向自動化思

考，故認知行為處遇介入的本質，非僅是就行為的改變，應能更長遠的改變中介信念的不適合價值態度，導正為符合處遇者原意的目標，最終用意即是要改變案主的核心信念，使其徹底的信念改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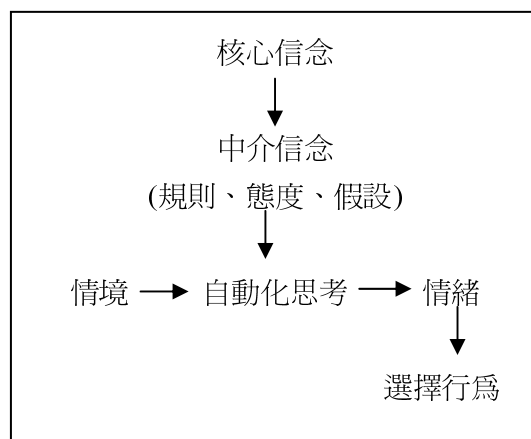


圖 1 認知行為運作層次（梁雅舒等譯，2003，頁 23）

認知行為取向處遇目的不僅是透過認知方式來修正案主的負向自動化思考，並進一步企圖影響案主的中介信念及其核心信念。惟假使中介信念及其核心信念是與整體文化價值體系相關聯的，有爭議性的主觀意識將會對認知產生矛盾性的挑戰。尤其是新舊主流意識的轉換階段，涉及父權價值結構理念的權力消長，而以個人內在取向的認知行為處遇模式介入，似有若干論點遭到質疑。

認知行為處遇是從主觀內在的過程出發，以探討和解決人們情緒和行為上的困擾，並關注於人的認知過程和認知結構，把認知看作是調整和改變人們行為的關鍵（劉耀文，2005：41-42）。其說明出認知行為處遇，首重個案必須覺得被他（她）們的舊思想所困

住，他（她）們必須要去相信，唯一逃離這個陷阱的方法就是去選擇改變自己的態度（黎士鳴等譯，2003：113-120）。爲此，就認知行爲取向處遇的精神論述，針對家庭暴力加害人而言，解構選擇暴力行爲是提升加害人意識，而改變焦點是促發內在「動機」，使其能反身自己的行爲和情緒，並進而協助終結自己的暴力行爲，亦即是「負起改變的責任」絕非懲罰，而是爲了自己及家庭更好的生活（楊連謙等人，2004）。

「知識告訴我們改變與否與「當事人」的意願有關，如今我們面對的「案主」

非比尋常，他們沒有被改變意願，所以我們就先來「改變」他們被改變的意願」

（引自王行、鄭玉英，2004：370）。

認知行爲取向的處遇方案脈絡，有其層次進程，首先步驟是以促使加害人瞭解現在個人的處境，及法令對其暴力行爲的限制，並探究個人目前因選擇了暴力所產生的負向形勢，進而針對所處文化、制度習俗所造就的男女性別意識探討，以期能瞭解時代變動脈絡，與對性別意識的重新省思，再者爲探究自身成長脈絡，與暴力之間的關聯性，尤其是從代間傳遞的學習影響層面著手，整個處遇重心是以「情境—想法—情緒—行爲」爲主軸，檢視原本認知僵化的暴力衝動模式，重新詮釋想法，將負面的自動化思考及非理性信念，透過不斷的學習，內化至實際生活場域，也因熟稔新的框架思維，產生了

與以往不同的正向情緒，如此將行爲改變成正向同理與良性的溝通策略。

肆、評估研究的相關議題

然在界定處遇方案到底有無效果，如何檢測？（柯麗評、張錦麗，2005：143）加害人是否降低暴力行爲？是否再犯？加害人處遇是否真的有績效？（成蒂，2004：129）一直都是相當爭議且是關心家庭暴力議題者所關切的焦點。同樣的美國在過去三十多年來，許多方案評估結果，由於諸多因素的影響，也都無法清楚提供方案實施是否成功的確定答案（張錦麗，2005：313）。但在政策推行者、專業人士、家庭暴力受害人、家庭暴力防治倡導者及廣大的納稅人而言，有效的處遇方案是他們唯一認同的重點。在此責信壓力前提下，目前國內外家庭暴力處遇團隊不僅將心力擺在認知行爲取向處遇過程與品質，且也在處遇的過程中及方案結束後，進行方案評估研究。

一、評估研究焦點

家庭暴力加害人認知行爲處遇方案所應回答的三個問題：1.認知行爲處遇方案，如何影響加害人消除對受害人的暴力使用。2.認知行爲處遇方案的成果，如何影響「關心人士」對方案的支持。3.以往所觀察的改變是可被證實，亦即是加害人的行爲和信念顯見的改變，是可被何種通常或特殊的機制所說明。

認知行爲取向對暴力的解讀與對策，較傾向由加害人自我瞭解暴力的緣起與發展，尤其是在何種情緒、情境中，特有的負向自

動化思考及非理性信念會選擇了暴力行為，故認知行為取向最主要的課題，是培養加害人對情緒的轉化和詮釋。也因新技巧的學習及具象化暴力認知重構，使得加害人未來能自我選擇較為利人利己的行為策略，以減少及消彌家庭中的暴力事件。此為認知行為取向應然面處遇結果，惟在實然面的處遇結果樣態，似乎受到不單是加害人個人選擇式認知所能掌握的權利，也即是外在的影響變數也應列入考量。

任何團體的運作及經營，除團體模式建構與專業化的努力外，仍須兼顧促成此團體成形的相關人員。如前所述，各類關心人士對團體是否能符合期待，以及團體的效用程度如何，是否真能轉化加害人的暴力，並進而促使其能為自己行為負責、改善與受害者關係等，為此，團體工作的責信是很重要的，也彰顯了責信的需求，故團體處遇效果就應在明確與有效的程度中著手。

但受限於法令規範及處遇時程的限制，致使認知行為取向處遇策略，有些許的矛盾，其中最重要為信念與態度的改變程度，是很難用度量方式檢測出來，尤其是針對「非志願性案主」的加害人而言，自我防衛機轉（否認、淡化、合理化、逃避...等）確實造成評估研究的困難。

（一）方案評估研究的目的

評估研究目的無非是如上述所提列的問題，針對認知行為取向的處遇精神與責信需求，乃至採用何種評估基準，才能提供最適性的處遇介入成效。更精確性的評估研究而言，認知行為取向方案的焦點，不僅是要加

害人在團體進行中認知轉化，及呈現對自我情緒的掌控與學習正向的互動態度外，且應能落實在社區中降低了再度施暴的風險，亦即是評估結果應是方案能契合「實際的生活」。另方案的結果不是單單藉由統計方法，也不是在案例和研究資料所假設的偏誤打轉（Welsh & Farrington, 2001: 46）。反倒是將評估內容更落實在介入後的持續性影響，且能貼近介入後所期許的目標為何，亦即是藉由評估研究的進行，不僅可正確引導處遇方案是否符合處遇對象的需求，也可判定方案政策目標是否達成，更進一步釐清處遇方案目標，擴大工作者的視野與工作價值，也提供予政策制訂者與社會大眾瞭解處遇加害人的依循脈絡。

評估涉及多方的利害關係人，他們大多對方案的成效有特殊期待，故成效評估應瞭解他們涉入家暴處遇的程度及他們所扮演的角色為何（Holden & Zimmerman, 2009: 18）？如是評估脈絡也斟酌方案是否能持續改變司法體系、受害人方案、觀護人員及其他有關家庭暴力機構的訓練，並能修正他們對家庭暴力加害人案例的反應，亦即是處遇方案除了對家庭暴力的兩造有效外，也應對參與的相關人員及責任機構有帶動效果，此即為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方案的延伸重點。

（二）方案評估研究領域

對家庭暴力加害人認知行為取向的評估，應不單以方案進行時程及處遇內容施行評估，也須考量暴力的現象、何種男人的方案介入及該進行何種評估研究。其本質上的差異，如權力與控制的脈絡、對女性的態度、

男性父權的脈絡、特殊的暴力虐待樣態及其他控制行為，亦即是須考量介入時的相應條件及暴力的現象是什麼，如此才能證明為什麼處遇結果是成功或不成功的緣由。也須就加害人個人特質與文化，結合至處遇內容及本質中，如此才能考量整體之認知行為介入系統、司法體系的連結、處遇型態、方案期程及後續的社區監控服務結合。評估研究也應適合方案介入方式評估，以及如何較結構性處理介入的適合議題，如研究目的為何？何者期待評估研究？研究標準為何？此廣泛性的評估向度，能含括一個周延的評估範圍，尤其是當處遇方案產生非在預期中的目標結果時，如處遇過程及實務中產生的改變，也能一併納入評估。

(三) 方案評估研究脈絡

任一個認知行為取向處遇團隊有其獨特的適應到特有的資源、領導者型態和工作人員態度（Serin & Preston, 2001:217），故每個處遇方案的成型是受到個別自身歷史和內部文化而形成，如要透過一致性的評估研究似乎無法一體適用。例如 Gondolf（2002:35）提出方案的背景關係與週遭的環境有很大的關聯性：1.如法院決定何人應進入處遇方案。2.誰再犯時會被警察逮捕。3.檢察官及法官對家庭暴力法的認知及配合程度。4.受暴婦女服務方案也會影響加害人處遇方案，尤其是影響加害人對加入處遇的動機，及改變對受暴婦女再度施暴。5.社區規範和對家庭暴力關心的程度也會影響處遇方案的進行與成效（Koenig et al., 2006:132）。如此將評估脈絡預設在微視的內在結構性發展，以及外部較

為鉅視的系統影響，是因整體家庭暴力防治網絡，對處遇中的加害人確實有影響，尤其是經過司法歷程而進入處遇的加害人而言，司法的功效與制約的確是不容忽視。

另就本篇以認知行為取向的論述主軸而言，加害人不僅應在暴力再犯的風險層次有不同的處遇需求，還須就文化信念、語言技巧及認知能力轉化而有不同的考量（Serin & Preston, 2001:216），尤其是在加害人個人的社經地位、人口屬性、與週遭他人的關係、兩代之間是否有暴力傳遞問題，而在社會脈絡的層次上，也因社會性別意識、認定暴力犯罪的層級和所屬社會階層的發展（Koenig et al., 2006:132-133），也或多或少影響處遇成效。例如臺灣北部的加害人處遇團體與臺南地區的處遇團體而言，同是進行認知行為取向的處遇團體，團體的成效如何對照比較，其對認知省悟與表達，以及實際在生活的運用上，可能會顯出區域的差異性，無法進行對照的比較，但如經團體的設計與工作人員的用心，是否能彌補此差異，也可列入評估研究的重點。

(四) 評估研究結果測量

大部分的評估焦點都是採二分法的方式，如方案未見成效時，即判定為失敗，但如此的結果是很明顯的窄化評估研究的目的。對某些男性而言，降低了他們暴力行為可能已是莫大的成就，然對其他男性而言，當再犯之後能持續保持無暴力行為可說是持續性的成功。方案時間限制性也可能導致方案不能落實處遇目標，但以家庭暴力而言，已有的司法權限制再犯，可說是另一種再犯

的防治。然因司法權介入家庭暴力領域，形成是否是處遇方案對其造成影響，或是加害人因懼怕司法的權威，而採較逃避或消極的心態，而抑制自己再度選擇暴力的使用，此因果間的關係是對處遇成效有一定程度的干擾性。

誠如 Gondolf (2002:37) 所言，方案的侷限是無法將具有問題製造者、反社會人格及暴力男人轉化成「完美的男人」。或許加害人對受害人的身體暴力消除，但轉而運用言語攻擊和性別歧視的方式對待受害人，故評估結果測量不是僅限制再犯的衡值，而是要關注在通常的暴力是否有停止、受害人感到安全嗎？他們的（家庭暴力事件的兩造）生活是否已全部改善了？

另有關結果的測量，尚包括：1.處遇的時程多長才算成功？加害人在處遇後的 6 個月、9 個月、1 年、或是 3 年的時間未再有身體攻擊的行為才算成功嗎？2.方案結果的評估是在方案剛開始時、中間時段或是方案結束後？亦即是方案評估測量是在加害人進入方案不久即評估，或是一段時間受方案影響後再測量？3.假使方案剛開始一段時間而已，加害人即再犯，但後來的幾年未再有暴力行為，是否成功？

二、以再犯率為方案處遇成效指標

國內部分在家庭暴力人處遇成效探討，領域相對於國外發展較晚，且因處遇方案仍未見成熟，故討論有關成效部分更是鳳毛麟角。學者王珮玲、黃志忠（2005：70-72）在內政部委託究中，曾就全國家庭暴力加害人資料庫的身分證比對結果，得出國內整體有無接受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的全部加害人，

其再犯率達 12.8%，但又從有接受處遇的 737 位有效個案中，有再犯情形者為 123 位，佔有效樣本的 16.6%，亦即是已接受處遇又再犯者達 16.6%，此為再犯的與接受處遇的矛盾現象，此可能是因接受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介入的加害人，其暴力嚴重情況高於一般僅接受保護令的加害人，故雖經處遇介入，惟再犯情況仍有可能發生。

（一）以是否再犯的二分法限制

如以再犯預防觀點監測處遇成敗指標，則應考量「改變的起跑線（change scores）」及「門檻的起跑線（threshold scores）」，亦即是加害人可能會在處遇需求及生澀的技巧上得分，但卻無充分的能力持續維持行為的改變，特別是加害人面對新的法令環境時格外明顯。雖然再犯在處遇方案中確有存在的理由，但它不是最好的處遇效用指標。又如缺少追蹤的配套措施時，較少的傷害受暴婦女及很長的時間再度施暴，是否也是處遇方案失敗的理由。唯此，如僅以二分法的判讀方式論成敗，則將妨礙對方案效用的瞭解（Serin & Preston, 2001:219）。方案成效如將典型的成功標準界定在有無再犯，且再犯的定义是以被司法介入或是被法院定罪為主（Belknap & Potter, 2005:560），那相關的訊息（如受害人所提供的再犯情形、加害人自我陳述），是否也一併列入再犯的評估中。

加害人是否會據實以報其暴力行為？由於暴力行為的自陳和加害人的利益其實是相互抵觸的，因此大部分的加害人會為了維護個人自身利益，盡量隱瞞暴力事實。加害人的報告既然可信度有限，那麼是否可能透過

受害婦女處得知真實的情況呢？同樣的，受害婦女常礙於加害人可能會有報復行動，而不願告知真實的情況（加害人的報復行動並不一定有所謂的肢體虐待，有可能是心理虐待），在這種情況之下，要瞭解加害人的暴力再犯率同樣的困難。（柯麗評、張錦麗，2005:144）。又當加害人強制進入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方案時，有些受暴婦女已經暫時分居或已離開加害人，致使加害人暫時無施暴對象時，加害人的暴力再犯率自然也會降低（Dobash, et al., 2000:70），此項因素自然也干擾了再犯率的指標。

如因避險原則，為將自身再犯的風險性降低，將原本暴力行為轉化成非實質暴力的型態（非明顯的身體或性虐待），以避免再犯的速成策略，如什麼都不做的消極逃避、中斷策略（停止爭辯、暴力行為之前中止、自言自語）、停止與受害人生活在一起等方式（Gondolf, 2002:147-148）。上述加害人的避險目的，在認知行為處遇團體中，是較易由同儕和處遇策略中習得，且是在防止團體中再犯的初級風險介入技巧，更是未來是否影響處遇成效的重要依據，但這樣的數據卻會令人存疑，因為不管暴力的次數是否降低或維持差不多的狀況，有暴力史的夫妻更需要面對的是彼此之間相處、溝通，以及對婚姻滿意程度的問題，暴力事件的前後，對彼此的觀感都會有所差異，所以即使暴力行為減少了，是否就可以重建兩人的婚姻品質、或回到暴力沒有發生過的情境重新生活？

（二）家庭暴力加害人異質性的思維缺陷

在提升處遇方案對家庭暴力加害人影響

的背後，通常方案應考慮加害人的需求和風險性。林明傑（2001：74）指出「認知教育輔導」如果依危險性之高中低而有長短差異，則容易因家庭暴力加害人之不滿而減低效果，然若不增加高危險（高致命危險或高再犯危險）之加害人的處遇期間則難以改善其心理病理（Serin & Preston, 2001:215），亦即是執行加害人處遇方案須考慮加害人的異質性，以及執行方案工作人員的態度，這事涉方案實施週數和輸送型態是否足以改變加害人的認知功能，及是否滿足加害人的處遇需求。

由上所言，家庭暴力加害人的異質性如未列入處遇計畫及成效考量，又未歸類在不同的處遇團體進行處遇，僅將其視為同質性的加害人，並奢求在團體中及團體結束後，期求一致性的不再犯行，此如同緣木求魚似的無濟於事。但就真實情況而言，各地方法院因對家庭暴力法的認知及對家庭暴力防治網絡的看法仍有紛歧，也導致其對加害人處遇的信任度存疑，故直接裁決須接受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人數，各縣市就有明顯的落差，致使加害人案量無法區隔不同類型的加害人處遇設計團體，而將所有加害人全部塞在一個團體內，這對再犯率的追蹤影響頗巨。

（三）司法體系對再犯定義暨處遇成效的干擾

家庭暴力防治法介入，確實已提升了警察的通報率和介入，並也促使犯罪司法涉入家庭暴力事件，明顯對受害人保護有正面的效果（Cho & Wilke, 2005:137）。尤其是女性主義者較偏愛司法介入及控訴的法律政策，畢竟代表所提倡的政策已顯著發揮效果

(Belknap & Potter, 2005:559)。但值得探討的問題是，司法介入是否已能充分達到制止加害人暴力再犯？或是因未清楚加害人的暴力本質，及不知加害人的實質需求時，司法介入反倒是被視同懲罰的錯誤行徑。

對暴力而言，何為司法的觀點？是以狹隘的身體虐待和性虐待來範定家庭暴力的樣態，或是較為廣義的解釋含括羞辱的傷害、大聲制止、噤聲不回應、注意力退縮等，全部都是司法所認知的家庭暴力行為。又司法的判準較採證據力的觀點，如暴力達到明顯傷害，然無具體證據或強有力的佐證資料時，司法是否有意願介入兩造糾紛？且司法體系僅是以身體虐待與性虐待等看得見的法律證據較為著力，而不是以社會歧視和個人衝突為主(Dobash, 2003:316)，如是無涉暴力關係與暴力使用的最終目的，唯此在司法體系內不難發現家庭暴力法官對暴力形式的態度有重要的關係。

在警察及法院行動的變項介入下，暴力再犯的情況減少或已無再發生，其是否能確定處遇效果是真真來自方案，也許加害人曾因被逮捕、司法程序及保護管束，而制止了暴力的再犯。其情形如同加害人因司法的介入後，產生了警惕作用而終止有形的暴力，換言之，如看了不是綠燈就是紅燈而停止了施暴，由此不困難發現司法在家庭暴力行為中所扮演的角色。此時司法體系在加害人的主觀認知中有其象徵性的意含，也即是地位代表主要的社會制度，可定奪什麼是對錯、什麼是社會所能容忍、什麼是社會所不能容忍。

進一步的延伸司法體系對再犯預防的效能，假設性的警察和法院的行動是過於拖延

時，再長時間的加害人處遇方案也無法達到預期效果，但如短期的處遇方案有較快速的司法授權委託的情況下，預期效果可能較前者為佳(Gondolf, 2002:155)。如此論證是似真成立，家庭暴力加害人在司法體系的影響下，是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成效成功的達成了預防加害人再犯，或是司法的介入已預先埋下了果。而再犯率只不過是因闖了紅燈的加害人增加或減少而已，因此再驗證再犯率當成主要的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成效是受到挑戰的。

伍、結論

何種評估研究機制能更周延的呈現評估結果？所呈現的評估結果是否有代表性？此為本文論述的重點。茲因就認知行為取向的介入本質而言，改變加害人的非理性信念，與對使用暴力的負向自動化思考是主要的處遇目標。如此所引伸的評估重心應是如何定位加害人在處遇中、處遇後的改變程度為何？如有那個加害人經處遇後再度被認定「再犯」，其再犯的威脅訊息，可列入修正或重新定位介入的處遇方向，但卻非指責式的批判處遇成效失敗。此非推卸之詞，如細觀前文所述，再犯的定義是牽連著司法本體，包括其對暴力及社會大眾期待仲裁的角色壓力，故再犯也僅是針對暴力而言，亦即是對暴力風險程度與容忍度之間的拔河問題，對加害人自身的改變衡量是較無著力點。

為此，在以認知行為取向的評估研究考量，應是針對其脈絡發展較多元的評估研究指標，不應侷限在加害人個人對所謂暴力的

行使，而應兼顧其對認知與行為的改變監測。就此點而言，國外學者 Dobash 等人（2000：299）曾以三種測量加害人處遇成效的指標量表，評估暴力、傷害、其他控制及強迫行為，分別為暴力評估量表（VAI, Violence Assessment Index）、行為控制量表（Controlling Behaviors Index, CBI）以及生活品質量表（QLI, Quality of Life Index）。上述三種測量工具的效能與目標分述如下：

- 一、暴力評估量表較以暴力傷害所造成的結果做衡量，將加害人施暴方式分為 28 種型態，從言語威脅、精神虐待的非肢體暴力，及用肢體及器具攻擊受害人等肢體暴力型態。各項暴力發生頻次則分類出加害人慣常施暴的類型，與欲求透過暴力威嚇受害人屈服的意圖。此量表協助團體帶領者瞭解成員的異質性，並適度修改團體帶領方向，將處遇介入目標落實在成員的差異性，增加方案的處遇效果。即至處遇完成後，再度施測成員的暴力型態與嚴重程度之改變，是否足以符合成員異質性所達到的處遇目標。
- 二、行為控制量表與前述量表之差異性在暴力型態的外顯行為，較聚焦於暴力所衍生出的背後意涵，所欲瞭解何種信念與價值觀支持與合理化加害人的暴力行為，將團體成員的控制圖象具體化，並作為方案設計素材，帶領成員個別省悟控制的深層意義，並形成自身困擾的徵結因素，以期能較根本解決家暴成因。
- 三、生活品質量表可協助瞭解個別性加害人的內心現實感受，探索與受害人的互動關係，與之在家庭系統中所應擔當的角

色，並體察暴力對家庭的傷害等自我檢測。此量表預設加害人如能感知自身能停止暴力，並有良好的行為控制時，未來的自我效能將會提升，間接促使受害人的安全感與幸福感增加，故行為控制得分較低者，生活品質的指數將升高，反之亦然。

上述三種量表施測時間在處遇介入前後，可瞭解到加害人個別化的改變程度，同時由加害人與受害人分別填答，可驗證量表的正確性，達到量表施測的效度檢測。唯筆者在實務工作經驗中發現，加害人接受處遇前，因經過司法程序及自身不利困境等影響，對量表施測有強烈的防衛性，造成處遇前後的施測信度有統計上的偏誤。有幸的，國內學者已針對 Dobash 等人所研發的評估指標（王珮玲、黃志中，2005：40-41），經本土化的修正，分別對目前有進行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團體的重點縣市，全面性的施測，期能建立一個非單一再犯為唯一指標的處遇成效指標。

在文中曾特別提及評估結果的外展性問題，此也涉及評估研究的結果，雖是較為外緣的效用，但就責信而言，如經專業化的認定程序是有效果的，不僅是對處遇團隊本身是重要的訊息，另一衍生效用則是「關心人士」會更加願意協助此項業務的推動，如此良性循環應是評估研究所更加期待的。

（本文作者謝宏林為東海大學社會工作系博士；曾華源為東海大學社會工作系專任教授）

關鍵詞：家庭暴力、再犯率、認知行為取向

📖 參考文獻

- 王行、鄭玉英（2004）。親職暴力處遇：介入與省思。王行編著，「輔導」工作的省思。臺北：心理。
- 王珮玲、黃志忠（2005）。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成效評估之研究報告。內政部委託研究。
- 王翠彬、陳雯婷（2005）。運用認知處遇於重鬱症患者之護理經驗。護理雜誌，52（1），74-79。
- 古永利、張永源、唐子俊、龍佛衛、陳能清、孫家瑞（2010）。Beck 憂鬱認知模式中不同認知因子關係之檢驗。中華心理學刊，52（1），47-56。
- 成蒂（2004）。終結婚姻暴力：加害人處遇與諮商。臺北：心理。
- 林明傑（2001）。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計畫-美國與我國之現況探討。律師雜誌，267，63-76。
- 林娟如、周桂如、夏一新（2010）。認知行為治療於精神分裂症患者的運用。長庚護理，21（1），41-48。
- 林瑞欽（2004）。認知重構團體療法對吸毒者戒治成效之研究。行政院衛生署九十三年度科技研究計畫。（DOH93-TD-M-113-027）
- 柯麗評、張錦麗（2005）。家庭暴力—理論政策與實務。柯麗評、王佩玲、張錦麗著，醫療系統回應家庭暴力。臺北：巨流。
- 陳金燕、張貴傑、羅明華、張欽祐、洪慧涓、王大維、曾仁美、吳百能、羅幼瓊、邱美華、李旻陽、黃聖桂、楊淑娥、彭秀玲、游淑華（譯）（2000）。諮商與心理處遇—多元文化觀點。（原作者：A. E. Ivey, M. B. Ivey & L. Simek-Morgan）。臺北：五南。（原著出版年：1997）。
- 梁雅舒、張育嘉、羅振豐、趙文煜（譯）（2003）。認知治療—基礎與進階。（原作者：J. S. Beck）。臺北：揚智文化。（原著出版年：1995）。
- 張錦麗（2005）。家庭暴力—理論政策與實務。柯麗評、王佩玲、張錦麗著，家庭暴力防治成效評估。臺北：巨流。
- 楊連謙、葉光輝、董秀珠、胡訓慈（2004）。弱勢婚暴加害人的困獸之鬥：論述進入醫療體系婚暴夫妻的權力歷程與處遇模式。行政院衛生署委託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 簡瑞良、張美華（2004）。認知行為處遇在處理憤怒問題的運用。諮商與輔導，231，34-38。
- 潘淑滿（2007）。親密暴力—多重身分與權力流動。臺北：心理。
- 黎士鳴等（譯）（2003）。認知處遇法概論。（原作者：R. E. McMullin）。臺北：。（原著出版年：2000）。
- 劉耀文（2005）。簡評認知—行為療法。焦作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1（4），pp40-42。
- Adams, D.(2000). Home truths about domestic violence: Feminist influences on policy and practice a reader. In J. Hanmer & C. Itzin, *The emerge program*.. New York: Routledge.

- Becvar, D. S. & Becvar, R. J. (2006). *Family therapy—A systemic integration*. Boston: Allyn and Bacon.
- Belknap, J. & Potter, H. (2005). The trials of measuring the “success” of domestic violence policies. *Criminology & Public policy*, 4(3), 559-566.
- Cho, H. & Wilke, D. J. (2005). How has the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ct affected the response of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to domestic violence. *Journal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Welfare*, 17(4), 125-139.
- Dobash, R. P., Dobash, R. E., Cavanagh, K., & Lewis, R. (2000). Home truths about domestic violence: Feminist influences on policy and practice a reader. In J. Hanmer & C. Itzin, *Confronting violent men*. New York: Routledge.
- Dobash, R. E. (2003). Domestic violence: Arrest, prosecut, and reducing violence. *Criminology & Public Policy*, 2(2), 313-318.
- Eadie, T. & Knight, C. (2002). Domentic violence program: Reflections on the shift from independent to statutory provision. *Howard Journal of Criminal Justice*, 41(2), 167-181.
- Gondolf, E. W. (2002). *Batterer intervention systems: Issues, outcomes, and recommendations*. Thousand Oaks, CA: Sage.
- Holden, D. J., & Zimmerman, M. A. (2009). Evaluation planning here and now. In D. J. Holden, & M. A. Zimmerman (Eds.) *A practical guide to program evaluation planning*(pp. 7–31). Thousand Oaks, CA: Sage.
- Koenig, M. A., Stephenson, R., Anmed, S., Jeieebhoy, S. J. & Campbell, J. (2006). Individual and contextual determinants of domestic violence in North India.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96(1), 132-138.
- Pence, E. L. & McDonnell, C. (2000). Home truths about domestic violence: Feminist influences on policy and practice a reader. In J. Hanmer & C. Itzin(Ed), *Developing policies and protocols in Duluth, Minnesota*. New York: Routledge.
- Serin, R. C. & Preston, D. L. (2001). Offender rehabilitation implementing in practice and evaluating effective programs. In G. A. Bernfeld, D. P. Farrington & A. W. Leshied (Ed.), *Designing, implementing and managing treatment programs for violent offenders*. England: John Wiley & Sons Ltd.
- Welsh, B. C. & Farrington, D. P. (2001). Offender rehabilitation implementing in practice and evaluating effective programs. In G. A. Bernfeld, D. P. Farrington & A. W. Leshied (Ed.), *Evaluating the economic efficiency of correctional intervention programs*. England: John Wiley & Sons Ltd.